

震》是我最好的作品，还有很多地方没来得及仔细铺陈开来。但是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作为小说家的命运，它使得我的发表之路变得畅通。从那以后，主动稿约的刊物和出版社渐渐多了起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部电影对你之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张翎：冯小刚导演经常和剧组说的一句话是：这个场景、这句台词的背后逻辑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这么说/这么做？剧本非常关注的是人物行为的背后逻辑。当一个人物/一个行为的内在逻辑是存在并且健全的，那么即使把对话删除之后，留白之处依旧有着强大的“地基”，经得起叩问和盘诘。这个思路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迪，我写小说时会更加警醒，关注事件背后的潜在逻辑，尽最大努力做到“意料之外”的情节一定要处于“情理之中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金山》是你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写这样一部作品，主要还是为了探讨国族身份与认同。在找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

张翎：最初的动机是用一个好故事来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、让一些没能发声的人说话。倒是没想到“国族身份”这样深远的话题——那是评论家的事。这样浩大的一个项目，调研可想而知是一个格外艰辛的过程。作为一个独立作家，我缺乏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撑，一切仰赖小作坊老牛破车式的运转。温哥华、维多利亚、广东开平来回跑，连复印一张纸也是自己花钱。这是最艰难的过程。到了写作的阶段，其实最艰难的路已经

走过了，反而相对顺利。

战争的孩子三部曲

《新民周刊》：叫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，而不是“战争三部曲”，为什么特别强调是“孩子”？

张翎：因为我的关注点并不在战争本身。我没有直面战争，书中关于战争的篇幅也不多。我更想探讨的是战争、灾难遗留下来的长久创伤。这种创伤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一个人生命的终结，甚至有可能延续到后世身上——所以才用了“战争的孩子”一词。《归海》里的母亲春雨以及女儿袁夙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“战争的孩子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归海》写的是一对温州母女的故事。从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夙的视角出发，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。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是你的自传性作品，袁夙是不是就是以你的母亲为原型来创作的？

张翎：《归海》里的母女两位女主人公，并没有基于某一个真实人物，她们是一群人的合体，或者说缩影。

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，受我母亲家族女性影响很大。我外婆在战乱和灾祸的年代里，生下十一个子女（不计小产）。其中十个长大成人——就在那个婴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，几乎算是奇迹。更加难得的是，她的十个孩子，无论男孩女孩，都得到了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对良好的教育。那个庞大的家族像一条又破又大、到处漏水漏风的木船，而外婆却硬是把这样的一条船在风雨

我对那种靠耐心坚韧存活下来的女性有极大的尊重，写她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
飘摇中行驶到了岸上。我从小都是听母亲外婆讲家族女性的生存故事长大的——在我的耳中，她们的人生轨迹无比精彩。她们的经历和性格给我后来的写作和审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我无法抑制要写她们的强烈愿望。《归海》的人物身上，肯定留着她们的精华气血。但和我其他小说本质上一样，《归海》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，尽管背景和故事细节都是真实的。发生在许多真人身上的散乱细节，被集中安排在了一个虚构人物身上，所以你可以说《归海》是100%真实的，也是100%虚构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感性与细腻永远是女作家的强项，你的小说很多也以女性为书写对象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，你是不是在小说中更关注女性的命运？是不是在写“一个女人的史诗”？

张翎：一个当代作家写历史事件，已经要经历跨年代的想象。一个女作家要写历史年代中的男性，那在经历跨年代想象之外，还要进入跨性别想象，这个困难程度肯定会加深。我写女性居多，一是因为女性在战争文学中经常是缺席的，二是因为同性更容易进入共情，技术层面上处理起来也容易一些。我对那种靠耐心坚韧存活下来的女性有极大的尊重，写她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，倒也没有特意要为女性树碑立传的意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么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的第三部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

张翎：肯定还是关于战争、灾难和创伤的话题，具体细节还在计划之中。☒